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335

Appendix III/Vol.II

17 September 1982

CHINESE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录三

第二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按国家和议题分类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GE. 82-66739

第一百五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2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和下午3时在
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M. J. 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丹吞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杨明良先生
冯增跃先生
胡小迪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明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诺斯拉蒂先生
莫哈马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默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哈尔福尤先生

荷兰:

弗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安德森先生

特奥林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纳扎尔金先生

璠莫夫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苏里科夫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埃夫多科欣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伦纳德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冈德森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康加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主席：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及其第150次全体会议开幕。

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轮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担任本委员会二月份的主席，而我作为伊朗的代表荣幸地担任了这一职务。在真主的保佑下，我将按照《议事规则》并在尊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的帮助下，努力履行我的职责和义务，贾帕尔大使的意见是极为宝贵的。不用说，我需要全体成员的合作，因为我对自己的任务是相当陌生的。但是，我希望我们伊斯兰革命赋予我的诚挚的道德和精神将克服我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正式经历的种种不足之处，因为我相信，裁军事业需要坚强的关心人类前途的道德因素，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的话。

首先，我要感谢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感谢他在担任委员会主席期间作出的杰出贡献。他的才干和外交经验指导我们委员会经过了种种困难的讨论，而且对于我们大家筹备本届会议也是特别有益的。

我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欢迎首次作为代表团团长参加我们会议的各位新代表。我还要欢迎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女士再次参加我们的工作，她将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

我还要提到，主管联合国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乌斯季诺夫先生以及裁军中心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也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今年，我们开始委员会工作之际，裁军之船遇到的似乎是顶风，因此船员们必须更努力地工作，以便使这条船能把握住正确的航向而不卷入军备竞赛的逆流中去。那些心怀不测、道德败坏的人发明的凶恶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该使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一起防止全球性的浩劫。因为，在日益险恶的核屠杀的阴影笼罩下，我们无法作为有理智的人生活下去。

我来自一个我国正在为反对强加的和持续的侵略而战的地区。我们对可怕的战争创伤有着亲身的经历，并亲眼看到我们优秀的革命青年所作出的英勇牺牲。我们遭遇的苦难更加增强了我们对裁军这一崇高事业的信念，正如对我们的侵略所抱的政治和战略目标根本达不到一样，这证明战争是全然徒劳的。因此，我们认为有义务努力建立一个用来反对潜在的毁灭性的军备竞赛的国际机构，人类的形成并不是为了毁灭他自己。人类负有崇高的使命，但是，如果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

(主席)

发动战争最大能力的国家不放弃战争和战争工具的话，人类就不能完成其使命。这显然需要人类去重新发现其“存在之理由”的根本起源。

这已不再是哲学家们的梦想了。从政治上说，这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我希望，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将由人类的关注和利益以及裁军的信念来指导。

我现在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发言，他将为我们念联合国秘书长的祝词。

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下面是联合国秘书长致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开幕式的祝词：

“当我第一次利用这个机会向裁军谈判委员会致祝词时，我是怀着极为不安的心情和高度的责任感的。我不久前刚刚就职，我谨在此表示，我决心全力地、坚定地致力于裁军事业，并坚决支持你们所作的努力。五十年前的今天，国联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裁军会议。在那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提出了两个基本前提：一武装的和平不能保证不发生战争；二军备竞赛本身就是相互畏惧和猜疑的根源，它会瓦解争取和平的斗志。

“今天，当委员会在世界公众对军备竞赛的致命危险表示普遍关切的情况下，召开1982年会议的时候，这两个前提仍然和五十年前一样恰当。然而对人类的危险却大大地增长了。军备竞赛积聚了大量的具有惊人毁灭作用的武器，核武器的存在已使努力争取裁军的任务变得特别紧迫。

“必须指出，赤裸裸的事实真相是：武库的现有水平同进行自卫的合理要求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这些武库竟如此庞大，如一旦投入使用，它们就会威胁人类的未来。另一事实是，愈来愈庞大的军备积累，极大地消耗了迫切需要用来减轻世界大多数人们所承受的贫困的资源。据估计，为整个人类提供一年必需品所需的资金比军备竞赛一个月的费用还要少。

“防止战争的问题的核心是裁军问题，但这个问题一直顽固地对抗着各种机构，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当然，裁军谈判要获得成功极为需要有利的国际气候。建立相互间的信任，纠正对他国军事实力和意图的错误看法，和平解决争端，采取核查措施，通过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来促进相互安全，甚至缩减南、

(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北之间的经济悬殊——所有这一切都和裁军的技术问题一样重要。

“世界决不能坐等理想形势的自然出现,然后再来采取裁军措施。裁军是不能通过对抗和谴责未实现的。军事优势的短暂的好处不可避免地会被由此引起的军备竞赛的长远的危害所抵销。我们应及早地认识到,各国和各族人民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他们共有的人性,也就是他们为争取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所共同担负的责任。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是在国际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候召开的。东西方之间在过去十年中煞费苦心才达成的,对稳定和平至关重要的谅解已被破坏。去年,螺旋形上升的军事开支在全世界又急剧增长。

“在国际事务的现阶段,迫切需要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取得可信的和实质性的进展。联合国正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届大会特别会议上,给裁军努力增加新的活力,并恢复在这一领域中取得进展的势头。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要停止军备竞赛遏止走向对抗的趋势,裁军的努力就是非常必要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对核屠杀的前景日益感到震惊的人们将会密切注视着这届特别会议,在这一努力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人们普遍地对委员会正在拟定的综合裁军方案感兴趣。开始制订一项有计划、逐步发展和分阶段的裁军方案是重要的,它将为大会特别会议所作的努力奠定牢固的、令人鼓舞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缔结盼望已久的全面禁试条约。这将为进一步限制和最终消除核武器提供巨大的动力。这对加强不扩散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

“裁军谈判委员会、特别是核国家进行新的、持续的努力,以期在核裁军这一复杂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也是极端重要的。十分清楚,某些国家要比其他国家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希望大家对于最近大会通过的“防止核战争”的决议将提出建议和具体意见。

“目前,当国际局势仍然阴云密布的时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恢复了中程导弹的双边谈判,这标志着前进的一步。我希望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不久也即将恢复。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对整个国际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将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并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巨大的贡献。

“祝委员会的努力获得圆满成功。

主席：我感谢贾帕尔大使，并请他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我们对他重要祝词的赞赏。

同时，请允许我提请各国代表团注意第CD/231号文件，题为“1982年2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大会第36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军的各项决议”。

我深为遗憾地宣布，维托里·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阁下于2月1日星期一逝世。

自1979年7月以来，蒙特泽莫洛大使一直是意大利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的常驻代表。直至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他一直是意大利的常驻代表。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诚挚的哀悼。

将在今天会议上发言的有墨西哥、荷兰、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代表。

我现在请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首先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历史上，我国所属的21国集团的成员——这一次是伊朗——再次主持了这个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年会的开幕会议。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此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并保证在你履行你的重要职责时给予充分的合作。我也想再次正式表示，对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尊敬的代表萨尼大使主持委员会1981年会议最后一个月工作的卓有成效的方式，我们深为赞赏。和你在开幕词中讲的一样，我国代表团也对新代表们表示欢迎，并如你刚才表示的那样，对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去世表示哀悼。

墨西哥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中首先发言，这已是多年来的老习惯了。今天我在首先发言时，首先想提及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即大会于1981年12月以138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的第36/83号决议。在这项决议中，国际社会最有代表性的机构联合国大会在满意地回顾了联合王国和荷兰已分别于1969年和1971年成为《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一般称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后，还满意地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也已于1981年11月23日交存了批准书，成为该议定书的缔约国。因此，现在只剩下法国尚未批准，因为这份议定书只向四个对该条约确定的地理区范围内的领土担负“国际责任”的国家开放。

我选择这项决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正如你们所知，墨西哥政府荣幸地作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保存国政府，这一条约建立了至今唯一有可能建立的涉及人口密集地区的无核武器区。第二，我刚才提到的措施虽然是平常的措施，但却是委员会自去年8月21日结束其1981年会议以来唯一具体的裁军措施。

在大会根据其第一委员会提交的决议草案通过的其他许许多多裁军决议中，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36/97 I号决议肯定应占据优先的地位。关于这项决议，我认为值得提及两点，第一，决议是协商一致通过的，第二，在序言部分

大会

(1) 再次重申其1978年12月16日第33/91 C号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a) 重申满意地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首脑于1977年发表的庄严宣告，其中他们宣告愿意努力达成协议，以便可以开始逐渐削减核武器的现有储存并且迈向这种武器的全面彻底销毁，以期世界上真正没有任何核武器；

(b)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三节所载《行动纲领》中最值得予以优先考虑的一项裁军措施就是缔结所谓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双边协定，随后两国应立即进行进一步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便导致商定的战略武器的大量裁减和质量限制；

(c) 强调《行动纲领》中确认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在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负有特别责任。

去年12月通过的第36/97 I号决议并没有局限于重申我刚才念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是重要的；该决议进一步：

(2) 重申正如1979年12月11日第34/87 D号决议所述，同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关于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判原则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中的看法深信早日就进一步限制和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达成协议将有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确实，去年12月的决议还：

(3) 回顾其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宣布的：单凭现有武库中的核武器，就足够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武器的增加，特别是核武器的增加，非但无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反而削弱国际安全；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持续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大会宣布裁军问题关系到世界一切人民的重大利益。

在去年12月的决议的执行部分中——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决议是协商一致通过的，也就是说这是在两个核超级大国完全赞成的情况下通过的——大会特别：

(1) 促请美国和苏联保证，“《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署后所开始的进程应予继续和巩固”；

(2) 同样明确地促请这两个国家“根据对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战略武器的大量裁减和重大质量限制达成协议”；

(3) 欢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根据1981年9月23日美国国务卿黑格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发表的联合声明，已于1981年11月30日在日内瓦展开关于核武器的谈判”，并深信“这一谈判将有助于增加稳定和国际安全”；

(4) 请两国政府“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7段和第114段的规定，使大会经常适当获悉它们谈判的结果”；以及

(5) 强调“双方需要自始至终地铭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该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感到极为失望的是，尽管墨西哥代表团和其他那些共同提出决议草案——即作为第A/C.1/36/L.42号文件提交给大会第一委员会的草案——的代表团同意在该草案中作重大更改，以便能使美苏两国接受此草案，使草案能协商一致通过，但现在有些人却主张，已经在这个城市举行的关于中程核武器的谈判和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不管这些谈判仍然被称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从今以后被称为“裁减战略武器会谈”），也就是根据我刚才援引的决议的规定早该恢复或应该即将恢复的谈判，我再重复一下，有些人却主张这些谈判应该和国际生活中的其他事件“联系起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这种态度特别令人失望。必须承认，核超级大国的国际行为，无论是从一方或另一方或从双方来看，往往不能令人满意。显然，要接受我刚才提到的“联系”的论点，就意味着决不可能，或实际上决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裁军谈判。如果大家同意——正如不到两个月前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最新决议中再次强调申明的——双方必须“自始至终地铭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该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那么这种论点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各国在1978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申明的庄严宣言，这一论点与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政策显然就更为不相容了，各国的宣言是：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是同达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建立基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以及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了解而作出的努力背道而驰的。军备竞赛妨碍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的实现，而且不符合《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尊重主权、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不干预别国内政等原则。”

上述宣言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希望：两个核超级大国根据《最后文件》第27和第114段的规定必将向今年6月7日开始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报告，将会有不仅在中程核武器方面而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取得积极发展的消息。

另一个也和核裁军有关的项目是去年联大的议程项目之一，并且理所当然地一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占首位，我们相信它今年还将占居首位——这就是停止一切核武器的试爆问题。现在我想就此项目发表一些看法。

如同大会在其三十五届会议上所做的那样，大会在三十六届会议上也通过了两项有关这一项目的决议，即第36/84号和第36/85号决议。

后一个决议谨慎而明确地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开展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作为将于1982年举行的会议初期的最高优先工作”。

无论是就这一问题的背景还是就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来说，墨西哥代表团有幸提议通过的前一项决议毫无疑问是更为明确和更为全面的。

在序言部分，决议显然是为了突出这些对于正确估计这个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事实，因而回顾到，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已经审议了不止25年；大会就此通过了40多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项决议；大会曾在七个不同的场合最强烈地谴责核武器试验；不论在核查问题上存在何种歧见，均无任何正当理由拖延缔结一项全面禁试协定；如果考虑到现有的核查手段以及关于这个问题一切方面所进行的详尽的技术和科学研究，可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项政治决定；作为部分禁试条约保存国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几乎在二十年前就在该《条约》中承诺努力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又明确重申了这项承诺。

在决议序言部分，大会还回顾其1980年12月12日第35/145A号决议，其中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支持委员会于1981年举行的会议开始阶段设立一个专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展开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并惋惜地指出，如委员会在那年的报告中第4.4段所述，由于两个核武器国家的消极态度，未能对此项要求作出反映”。

在决议的执行部分，大会除了吁请《莫斯科条约》的保存国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暂停试验外，还特别重申对于核武器试验仍然在“违反绝大多数会员国意愿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一事再次深表关切；重申其信念：多年努力而未能取得成果的这项条约“构成顺利防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将对核裁军作出贡献”；并再次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国”；

“(a) 铭记着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条规不应被用来妨碍设立一个有效履行委员会任务的附属机构；

(b) 支持委员会于1982年会议开始阶段设立一个开始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

(c) 竭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委员会可将多边谈判达成的条约案文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当我们开始实质性工作的时候，我们应忠实地争取实现的正是大会提出的这三项要求或建议。应该回顾的是，1981年7月30日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瑞典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团提出一份工作文件(CD/204)，其中建议，如果“在委员会1982年会议——即今天开始的这届会议——开始召开时仍未能实现21国集团反复提出的要求，即设立一个讨论“核禁试”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该工作又件所载有的建议就应由本谈判机构在全体会议上正式审议。该文件的建议即对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5条作下列补充规定：

“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规定不应被用来阻碍为了有效地发挥委员会的作用而按照第23条规定设立附属机构。”

我国代表团谨希望，我们将没有要求助于议事规则的这一修改，以防止把联合国安理会中经常出现的滥用否决权的现象搬进这个多边的裁军谈判机构中来，后者的性质与前者是根本不相同的。

按照《最后文件》的条款，核武器是占最重要优先地位的问题，而按照同一文件，仅次于它的优先问题就是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化学武器，即文件中唯一具体提到的这类武器。

正如对禁试问题一样，大会对此通过了两项补充性决议，第36/96A号和第36/96B号关于“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的决议。综合这两项决议的内容，大会显然希望明确而清楚地：

重申“所有国家必须严格遵守《日内瓦议定书》的原则和目标”，并重申所有国家必须加入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公约；

还重申需要“尽早制订和缔结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吁请美国和苏联“尽早恢复关于这一问题的双边谈判”，并“将其联合倡议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还吁请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还应该指出，看来大会希望强调它对另一项呼吁的重视。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说来，这项呼吁应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对委员会本身的呼吁。关于所建议的消除化学武器条约的问题，大会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1982年的会议开始时，作为高度优先事项，继续就此一多边公约进行谈判，谈判时要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倡议，并特别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重新设立一个任务规定经适当修正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委员会能尽早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我国代表认为，本谈判机构有不可逃避的责任重视大会的这一呼吁，这一呼吁在这两项通过的决议中以相同的文字出现。事实上，第36/96A号决议是在不少于147票赞成、零票反对以及1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

我刚才匆匆回顾的六项决议仅占去年12月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关于裁军问题通过的大量决议的八分之一。想在这里不管如何粗略地审议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不适当的。但是我想指出，这些决议中的某些决议，比如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决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值得就此发表一整篇发言。我希望，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开始审议这个项目时，我将能作这样一篇发言。在结束我今天发言的时候，我只想再就“世界裁军运动”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补充几点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会以143票赞成、零票反对以及只有两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第36/92C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在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报告中的内容，并推荐其结论后，请秘书长将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报告和各国政府的意见送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便大会庄严开展裁军运动。决议明确地指出，开展裁军运动的一个主要行动应该是在特别会议的最初阶段、当各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各国外交部长都在纽约之际举行一次“认捐会议”，我们希望，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外长将出席那次特别会议，正象1978年第一次特别联大时那样。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我只想回顾一下我在此地和纽约经常讲的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我说我们相信，正在临近的特别会议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案》的进展情况。这就增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责任，第一届特别联大赋予本委员会拟订该《方案》草案的任务。正如大家知道的，委员会正努力在其关于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中草拟一份《方案》的草案，该小组至今已举行了47次会议：1980年共10次，1981年共24次，今年已举行了12次。我还想重复一些去年10月我在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开始时讲的话，我当时冒昧地提出我国代表团认为《方案》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即忠实地反映1978年《最后文件》第109段明确规定的方针，以及不应载有任何在文字上和精神上可被解释为从《最后文件》倒退的条款。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理查德·费因（荷兰）：主席先生，荷兰代表团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期间第一个月的会议主席。您将在这一职务中负起重大的责任。我们谨向您保证，荷兰代表团愿意在促进我们共同事业中同您全力合作，并祝愿您成功。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您一起为我们的好朋友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去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哀悼。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的会议开始之时，我今天要在发言中先讲几点一般性的意见，谈谈我们工作的性质和职责。然后我将指出我们所认为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会议期间的主要工作。

但我首先不得不发表一点政治方面的意见。本谈判机构多次遵循并从来没有认为可以违反的是，裁军谈判对总的政治气候十分敏感是由性质本身决定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各会员国的安全利益。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人们也许可以在其他一些国际论坛中使自己置身于国际动乱之外，但在裁军谈判中就办不到。指出这点之后，我还应该说明，在另外一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机构并不适合于具体处理各种国际危机，尽管它们在世界各地不幸地经常发生。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我们的工作进展就会比现在还要小得多——不幸的是，现况就是如此，我们也没法把我们的事业做好。

今天，正是经过这样反复权衡之后，我要在这里指出，我国政府对波兰的严重事态发展深感痛心，强迫实行军事管制法，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公民的基本自由遭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到压制，这一切都明显地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此外，如果某一军事大国一再为了它自身安全的假想利益，认为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的邻国，这就不能不对包括裁军谈判在内的广泛国际关系领域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人们从这种行径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归根结底，这个军事大国同邻国关系中最终和压倒一切的因素是，它本国的安全利益是建筑在损害别国的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现在我愿意就现存的和与我们有关的多边裁军机构，即一方面是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另一方面是纽约的联大第一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发表几点看法。

我们这些去年参加过大会的人都知道，第一委员会又通过了越来越多的决议，尤其是关于裁军方面的决议。而我们这些从事裁军工作，或至少是从事联合国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人都会记得，第一委员会并不总是那样有成效的，至少是如果你以决议的数字作为衡量成效标准的话。假如我们追溯过去，追溯到二十年前——第十五届大会，你将发现，第一委员会那时只通过了五个决议，每个决议只有二或三段前言部分和少数几段执行部分。这些决议中的每一个都经过几个星期的协商，决议的每句话都经过仔细推敲。正因为这样，这些决议受到全体成员国的重视。十年以后，也就是在1969年的第二十四届大会上，大会通过的决议增加到九个，它们的篇幅也大大增加了。去年大会通过了不下四十八个以裁军为题目的决议，其中前言部分和执行部分共达623段。

我刚才讲的，以及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提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不瞒你们说，我并不认为这种发展是积极的。使我更不以为然的是，去年大会顺利地通过的决议中，有些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些决议是宣传性的，甚而是不怀好意的。有的我觉得还相当愚蠢。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很好地记住，人们指望它成为一个认真的谈判机构，而不要因为大会的这个或那个决议有大多数国家同意，就认为这些建议必然有利于真正裁军。但是，无论如何，荷兰代表团将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项决议就象我们认为它被提出是认真的。在这里我只能表示，希望第一委员会设法以更加负责的态度行事，不要再象它近来不幸形成的习惯那样不负责任。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对纽约的第一委员会发表这些意见之后，我应该公正地指出，就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作风而言，不能认为这个机构本身已无懈可击。我们不时看到本委员会有一种趋势，那就是想把这一协商机构当作另一种进行宣讲的论坛。我们还不幸看到，这里有着日益增长的趋势，就是运用某种策略手段，有时是欺骗手段来妨碍工作的进展。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还能够说，这里也存在着某种非常认真地试图改进我们工作方法和程序的愿望。

在这方面，我愿意回忆去年我们对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所进行的有益讨论。经过考虑，我们认为，理想的做法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全年举行会议，把会议分成三或四个阶段，休会期间进行研究和评议等工作。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全年开会，代表团里就可以配备谈判专家，他们就能不受别处审议工作的干扰。按目前的体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负责进行谈判的人，还被指派到诸如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和大会第一委员会等审议机构去评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结果，实际上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使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能力受到损害。本来可以用来进行谈判的宝贵时间无谓地赔进纯属审议性质的会议去了。

因此，我们建议，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提高工作机构的效率问题上得出结论。工作实践和组织机构两方面都有理由要求由裁军谈判委员会自己进行整顿，而不应把这项工作交给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

我们主张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以指导委员会，即管理委员会的职权，在它的领导下，设立长期的或永久性的工作小组进行工作。这些工作小组具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它们可以制订自己的计划并设立附属机构。这些工作小组应该有个固定的主席，一个中等规模的办公机构，不应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会员承担参加每个工作小组的义务。与此同时，应允许非会员国但对某一议题感兴趣的国家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这种安排对解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员资格问题会有很大帮助。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要增加专家人数。看来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必要象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和裁军委员会会议一度做过的那样，再次招聘一个译员和速记员的班子。这样逐字记录就可以较快地搞出来，代表团就没有必要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进行认真谈判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时应拨给附加费用，我认为这笔费用可由本委员会的会员国分摊。工作小组可以定期或遵照要求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报告。裁军谈判委员会此时可以评议工作成果并在适当场合给予工作小组以进一步的指导。与此同时，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指导委员会可以放手地象清理事务所那样去应付政治紧张局势，这样工作小组就可以不直接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认识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组织机构的改进本身并不能保证取得更好的工作成果。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目前规定每个工作小组每周一次例会的制度有严重缺陷。这一制度的缺点之一，是它并没有考虑到，有的议题在各个不同的谈判阶段比别的议题可能更加消磨时间。

现在我要谈发言的第二部分，其中我将概括说明荷兰对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的工作计划的态度，我应当欢迎美苏两国关于中程核武器问题的双边谈判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否则，我就没有尽到责任。我们认为，美苏两国之间尽快恢复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双边谈判也同样重要，因为核武器的大量削减是走向核裁军的重要步骤。荷兰政府强烈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些谈判将会出现较好的前景。我们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未能生效一事始终深表惋惜。因此，我们现在更加希望，我刚才提及的两项新的谈判，将为这两个有关国家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军备管制谈判奠定基础。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和苏联把它们共同努力扩大到其他同样极端重要的领域，例如，首先，关于全面禁试问题，在这方面，人们要求恢复包括英国在内的三边谈判；其次，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问题；和第三，关于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春季会议的大部分活动都是用来保证成功地为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做好准备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把优先地位放在实事求是地开始讨论全面禁试问题，这也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次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优先项目。把重点放在全面禁试的理由已毋庸赘述，因为我们已经在许多场合反复阐明，我们希望逐步削弱核武器的作用。在这方面，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会作出重大贡献，有助于制止核武器的纵向扩散和横向扩散。事实上，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就是对如何掌握核军备竞赛的许多非常错综复杂的方面的一个具体而实际的示范。要求在短期内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另一个迫切的原因是，如果不搞全面禁试，就不可能维持一个非歧视性的和可信的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不扩散制度。

荷兰代表团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就全面禁试问题进行认真的和建设性的谈判，但是我们担心人们对全面禁试条约的兴趣事实上已经逐渐减退。荷兰政府深感忧虑的是，人们经常地，从各个方面对签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意义一直在提出疑问或者予以贬低。

我们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和问题的迫切性都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并赋予有意义的工作任务。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方面所起的作用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条约能获得——它应该获得——最广泛的国际支持和拥护。我们不仅认为有必要在全面禁试条约中规定适当的核查措施，而且我们深信，适当的核查是可行的。至于技术上的困难，我们相信，特别是有了荷兰也参加的地震活动科学专家在特设工作小组中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经验，都是可以克服的。我要提醒大家，这个小组在设计一个全球核查系统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人们要求在这些方面所作的努力，包括地震系统的全面检查，继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在全面禁试条约范围内制定行政性组织的时机也已成熟。

全面禁试条约的必然结果是签订一项所谓的“停产”协议，该协议规定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物质。这也是遏制核军备竞赛的一个有效步骤。我们不是不知道所涉及的核查问题，但是停产是少数几种有效核军备管制措施的一种，这些措施国际核查系统已原则上制定出来，那就是：核保障制度。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合乎逻辑的。

理所当然，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应该重新成立。荷兰代表团同其他一些代表团一样，都认为去年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能干的瑞典大使利德戈尔德的领导下，已接近完成它的工作任务。因此，我们迫切希望，现在就可以商定一项新的任务，授权特设工作小组，作为优先项目，制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

特设工作小组在讨论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之后，还必须深入讨论公约的核查条款。我们认为，核查应成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个系统同有意义的范围和合理数量的保护措施一起，要比维持化学武器的选择使用，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多的民族安全。没有适当的核查，各国就不会相信公约规定的条款会得到遵守。我们以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前讲过，经过反复考虑，我们认为在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国家的和国际的核查是相互补充的。总之，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武器系统现成的和大量存在的武器。

去年夏季会议结束时，在1981年8月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43次会议上，我曾荣幸地向大家提出过关于在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的协商和合作，核查措施和申诉程序的CD/203号文件。这个文件为一个合情合理的、然而有效的核查制度拟定了详尽的提纲，在拟订过程中还专门考虑了各种具体需要。请允许我简单地重述我们提案中的主要特点：

- 协商、合作、核查和申诉不是个别对待的，而是一个完整的，连贯的系统的组成单位。
- 因此，国家和国际核查是相互联系的。
- 要求成立各国的国家执行机构。
- 国家执行机构将特别同即将成立的协商委员会紧密配合协同工作。
- 协商委员会应长期监督已公布的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和转用为被准许的用途。
- 协商委员会必须通过长期的现场视察对销毁和转用进行监督。
- 协商委员会通过不定期的现场视察，定期检查剧毒性致死化学品的生产不超过规定的数量。
- 为了增加信任，协商委员会应不定期对各缔约国的设施进行视察，将通过抽签指定的办法定期进行。
- 协商委员会应有权调查关于被指控为在遵守公约方面态度不明或指控为违反公约的事实。
- 在进行这种调查时，协商委员会只有在同有关缔约国协商后才能进行。如果该缔约国不同意现场视察，它必须作出适当解释。
- 本公约每个缔约国可以使用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 可向安理会提出申诉。本公约每个缔约国在安理会可能发起任何调查时，予以合作。

鉴于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去年的活动成果，和巴基斯坦提出的第36/95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号大会决议获得极其广泛的支持，荷兰代表团当然赞成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的重新成立。去年我们对安理会的决议提出一个标准“共同方案”，它包括了各核武器国家正式声明中的共同点，受到积极的重视，对此，我们确实感到高兴和鼓舞。但是，看来特设工作小组去年确是按照我们要求的程度来处理了各项问题的，而现在皮球主要还在核武器国家的手里。因此，我们要求有关的核武器国家共同努力，使它们各自的消极安全保证更加接近并尽可能地相互协调。如各有关核武器国家不进行共同努力，我们就看不到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有任何进一步开展工作的余地。这样，工作小组也就会多少处于袖手旁观状态。

在第三十六届联大期间，荷兰代表团遵照第一次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有关条款的规定，曾为通过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决议草案积极工作。大会决定把这个重要问题委托给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对这一复杂而又颇为敏感的问题采取两阶段处理的办法。第一阶段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春季会议期间，可制定一个摸底计划，目的是把所有可能突然出现的问题列出一个目录。为达到这个目的，各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并递交工作文件之后，最好能同专家们举行一系列非正式会议。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大约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夏季会议期间，这时可以采取其他适当行动，如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有关所谓放射性武器方面的进展并不能说服我们去改变我们在1970年第CCD/291号工作文件中所表明态度，当时我们会断言：“根据现有情报判断，放射性武器作战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看来不会有多大实际意义，或者甚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我们基本同意瑞典大使利德戈尔德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4月7日第122次会议上发言中的精辟分析。我们赞赏瑞典试图加强本来参数极小的放射性武器公约草案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荷兰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7月14日第137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对原来瑞典的提案略加修正的方案。

不论重新成立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谈判结果如何，荷兰代表团不会仅仅为了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上拿出成果，就热衷于帮忙弄出一个公约。如果要拟订放射性武器公约，那就应该是一个有实质性内容的，特别要对袭击高辐射强度民用核能设施所引起的放射性物质的扩散能提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出有效的禁止办法。

我们相信，按照我刚才提出的方针，执行本年度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计划所需要的组织安排不会遇到程序上的困难。总之，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成立特设工作小组和给这些小组选择主席时，可以依靠过去几年所取得的经验。我早先发表的、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最理想的工作结构的意见，不是针对眼前的紧急任务的。看来，最好的程序是遵循我们去年采取的行动方针，同时齐头并进，为今后商定一个较好的工作结构。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将是综合裁军方案。裁军谈判委员会已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负责准备这个综合方案。荷兰代表团支持第 CD/205 号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办法，这个文件是去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代表一批西方代表团提出的。也许我可以对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个人意见。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相信综合裁军方案能对裁军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当然，国际社会能制定优先次序和目标，并确立原则，如同关于裁军问题的第一次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所做的那样，这个文件我们仍然赞成和拥护。我承认军备管制和裁军的过程中存在着阶段，但是，我的意见是，人们不应从这些阶段同时间的关系来认识它们的意义，而应从这些阶段同对现有安全安排的广泛信任或不信任的程度的关系来认识它们的意义。

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全面的标准可以用来选择一套适合于某一特定阶段的军备管制措施——不论它们是怎样地重要——如果不能认真理解关系到同某一特定安全环境有关的军备的重要性的话。鉴于这种情况，提出模糊不清的种种界限，看来对整个事业的信用似乎毫无用处甚至有害。军备管制和裁军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极大的热忱，在这方面，只能一步一步地在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才能获得结果。显然，在着手协商某些军备管制措施时，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必须采用，那就是对拟订中的协议条款遵守情况的可核查性。这种现实的做法有助于建立信任，如果不是经常不断地培养信任，寻求促进军备管制和裁军的计划就不能取得进展，这个计划要求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给予认真的对待。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换言之，对荷兰来说，一致通过的第一次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所包括的行动纲领，仍然是未来行动的指南。要使综合裁军方案具有意义，就一定要尽可能严格地遵循最后文件的行动纲领。但是我们不准备把在综合裁军方案上达成一致的~~程度~~作为衡量军备管制工作上所取得成就的一般标准，以及作为衡量第二次联大特别裁军会议取得成就的特殊标准。军备管制是此时此地的问题，特别是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详细的，往往是艰苦的谈判来进行的工作。

无论综合裁军方案的进展情况如何，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的成就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放弃肤浅的和不切实际的提案，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有效和可核查的军备管制措施的认真谈判以加强安全与稳定。

最后我愿意谈几点我个人的问题。现在距我参加当时称作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时间已经四年了。在这四年中，我被授权在日内瓦和纽约为我国致力于促进军备管制和裁军工作。不久，我就要离开日内瓦，也许不是永久的，但至少暂时要离开，不再担任荷兰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在接替我职务的弗朗斯·范唐吉大使到达之前，估计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将由瓦根马克尔斯先生代理。四年来，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大会秘书处的同事们给予我的友谊和合作，我将铭记在心并深表感激。当我提到我的同事时，我不仅是指那些来自我们盟国的同事，也包括那些属于别的盟国的同事，以及不属于任何同盟的同事。个人的尊重、敬佩和友谊与有时要使我们吵吵架的官方关系并存，这也许是在本委员会工作中最令人满意和深受鼓舞的现象之一。祝愿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荷兰代表在他发言中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代表瑞典代表团就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这一崇高重要的职务表示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我向您保证，瑞典代表团将在您担任主席期间给予充分的合作。我还愿感谢您对我所说的一番友好的欢迎词。而且，我还要向在1981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后期有效地履行了职责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表达瑞典代表团的谢意。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主席先生，瑞典代表团愿和您同声欢迎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新的代表团团长，并和你一起对意大利代表团团长的逝世表示哀悼。同您一样，我们也极为赞赏荷兰的费因大使在任荷兰代表团团长四年期间的合作。我认为，我们两国代表团之间有着极好的合作关系，为此我愿向他表示感谢，并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

1978年1月31日，即联合国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前的四个月，我在裁军委员会会议发言时特别讲了下面的话：

“在本届会议期间，裁军委员会会议将面临它16年历史中最大的挑战。正以忧虑和急切的心情盼望着多年来为裁军所作的努力能产生决定性结果，外部世界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个谈判机构呢？是否会把我们看成根本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的一帮游手好闲的清谈者呢？我们是否已设法使本机构以外的世界看到了那些责成我们去解决的问题之复杂性，以及我们在寻求解决办法时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严重障碍呢？外部世界是怀疑还是相信参加裁军委员会会议谈判的各国政府为最终达成解决办法所抱的真诚和坚强的政治意志呢？

“正如我在四年前所说的，我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所知道的是，从现在起再过几个月的时间，世界社会中最有权威的机构将要检查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效率 and 成果。现在，我们这些来自两个军事集团、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的代表们要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必须在春季会议期间努力工作，以使我们提交给联合国的特别报告能反映出在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领域里取得的持久进展。”

当我重读这些话时，我觉得过去的四年就象是一场梦，从我们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历史中消逝了。从那时以来我们没取得任何结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虽在努力工作，但却是徒劳的。值得注意的是，形势仍和1978年初一模一样，有些情况甚而比1978年初更糟。

的确，有些谈判工作小组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展。但这并非是由于主要军事大国做出了贡献，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持之以恒的努力。显然，这些国家比大国更加明了当今世界所处的极为危险的局势，它们更加急切地要使我们的世界摆脱对其前途的威胁。

相当坦率地说，我怀疑这些国家对多边裁军谈判的态度是否是真诚。我的印象——并不仅仅是根据我过去三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经历得出的——是：超级大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国在削弱和破坏这些谈判。它们喜欢搞秘密而有限的会谈，根本不听他人的意见。它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只是起一个邮箱的作用，把它们的条约草案送往联合国，尽管这类条约草案也是少得可怜的。它们否认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权并有可能讨论议程中享有最优先地位的项目，例如，最重要的全面禁试问题。它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限制各谈判工作小组的职权。它们无视在法律上无约束力但要承担政治义务的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尽管它们也投了赞同票。

最近我们得到的报道看上去又一次地证实了我刚才所说的话。我们十分震惊地从报界得到的官方消息说，除了按照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在本委员会内进行的谈判之外，美国准备提议就化学武器进行另外的条约谈判。美国的企图是一旦这些谈判失败，它就能阻止国际社会的批评，并使其为生产这类武器的新一代所作的准备工作合法化。提议召开的会议将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签字国之间进行。的确，这份缺少核查手段的《日内瓦议定书》有必要加以完善。但是，把这样的谈判作为掩盖生产新的化学武器的烟幕则是不能接受的。

据同一条消息说，有人准备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来集中“讨论”苏联对阿富汗游击队使用毒气这样一个有争执的“问题”。我们是否能理解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一多边的谈判机构将要降格成为一个互相指责的论坛，而且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取得的相当大的进展也将会付诸东流？我希望美国代表团就其目前的计划作出解释。

最近被激发起来投入各种反对险恶局势的活动的世界舆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名望起了破坏作用。早些时候人们有的是期待和希望，但现在有的却是失望。早些时候人们很感兴趣并参与活动，但现在却只是耸耸肩膀表示无能为力。1978年当我谈到“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会议是不对世界舆论开放的。自1979年1月以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对外公开了，在这以后，开始对全体会议的旁听者十分踊跃。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席上几乎经常是空无一人。特别是在公众舆论觉醒并前进的时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应对这种现象给予严重的关注。与这种现象休戚相关的世界人民是否仍相信我们可能会取得的进展，还是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只是耸耸肩膀呢？

当我们开始考虑1982年春季会议期间可能取得的成就时，我们的确面临这些严重的问题。而回顾刚刚过去的1981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也并不少。让我们坦

率地说吧。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1981年又是裁军毫无收获的一年。是否有理由认为刚刚开始1982年会较有收获呢？实际情况的确是矛盾的。在政治领域里，超级大国与它们的军事盟国间的关系充满了严重的不信任、怀疑和惧怕。对阿富汗的侵占已持续了三年，仍然看不到能达成一个为阿富汗本国或国际上所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区域性战争、紧张局势、单方面使用武力和并吞他国领土已成为海湾地区和中东局势的特点。在这两个地区都是经济上极为重要的，都是超级大国进行争夺和干涉的焦点。

在欧洲，为增强信任和合作所作的努力——如在欧安会的马德里续会上所作的那样——通过波兰的自由和民主的愿望被凄惨地镇压而得到的启示它严酷地提醒人们，安定是多么的短暂。这再次提醒了世界人民，强加给东欧的共产主义真面目是武力，这武力可以用来征服人们的生命和思想，但在一个有自由，能不受威胁地进行选择的社会里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觉到社会军事化的威胁，特别是核武器的积累并可能扩散的威胁从而想有所作为时，紧张和冲突的根源就愈形加剧，使得这些问题的解决越发困难了。

尽管如此，还得寻求并找到解决紧张和冲突的办法。瑞典将继续提倡采取扩大范围的建立信任的措施，以缩小国家间的不信任、猜疑和惧怕，增强国际关系间的坦率和人民的自由。

这不仅是由于政治现状的灾难性结果，而且也是由于这些紧张和冲突对军备竞赛产生的后果，军备竞赛本身就是增加紧张和冲突的一个因素。

这些后果中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表现是军事研究和技术目前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当前发展的方向如果不在十年内加以制止的话，很可能最终会使军备管制成为泡影，裁军就更谈不上了。虽然这很可能是军备鼓吹者们的并不那么秘密的愿望，但它却只能导致惊人的不稳定和越来越不安全。在军备管制的历史中，充斥着失去的良机 and 所谓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些一经发展便成为最具有引诱力的军事设备。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曾一度是这种可谈判的商品，现在已成为弹道导弹技术的中心特征。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虽限制了此种武器的数量，但可言的是，该条约未获批准，这可能会导致弹头的继续增加。这不仅会控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败为防务所作的努力，而且会破坏军备管制。

在这方面，新的巡航导弹技术则更是一种不祥之兆。巡航导弹的小小体积，能够运载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常规武器，这样它们最终会成为一种破坏稳定的武器。如果象计划所列的那样，把它们大量部署在可移动的发射台上并且以超音速度运行，那么它们就会更具破坏力。而且，巡航导弹的飞行特点和可能的部署地区也会对中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安全和主权起消极作用。最后，从军备管制的观点来说，巡航导弹可以完全不顾充分核查的约束。鉴于所有这些原因，巡航导弹技术代表了量子跃进。由于它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最好不要采纳。如果那些在裁军领域中坚定地支持严格核查措施的人——如果从好意去理解他们的话——把赌注压在无法核查的巡航导弹上，这将很可能葬送为国际裁军和军备管制所作的努力，或至少是使之无法成功，这样做的确是令人啼笑皆非了。而且，一旦他们的对手掌握了同样的技术，他们的军事优势就是暂时的，而且优势很快会明显地变成劣势。没有理由认为对手不会这样做。而军事技术的螺旋式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军备竞赛将会继续下去。

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做出决定性努力，以寻求控制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当然必须是可核查的办法。军事研究和发展不仅吞噬了大量资源——1981年中至少花费了四百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而且目前已把我们带到了有去无回的边缘，即使军备管制将变成毫无可能，不安全和各国之间的相互猜疑会比现在更为严重和危险。在军事领域中谋求技术优势以及全面的军事优势，不折不扣地是死路一条。

和两年前一样，我愿在这个机构里再次指出如下事实，即由于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迅速而巨大的进展，时间成了一个关键因素。这些进展使得就能接受的核查措施达成协议方面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而谈判和缔结协定所拖的时间越长，要取得结果就愈困难。我们都应以这种合情合理的惧怕心情认识到这里存在着的这个势头。

我们必须向超级大国发出紧急警告：这两个国家必需认真考虑它们肩负的重任要对它们所花的占世界军事研究和发展的百分之八十五的经费负责。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在国际合作中必须寻求压制进攻性军事目的的研究与发展的办法。根据很多文件记载，许多系统如只谈到试验问题为止，不涉及其他，是可以谈成功的。压制这类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办法可以通过早期发现武器研究和发展的新的危险倾向的办法，以便阻止这类武器的试验和部署。下列条约已创了先例：如反弹道导弹条约、生物武器公约、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条约、反卫星技术的会谈以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商定的某些限制。另一个补充办法就是全部地或部分地——我要强调部分地——禁止把某些地理区域用于军事或敌对目的，正如我们过去就南极、外层空间和海床方面所作的那样。

巡航导弹是最近开始进行的战区核力量谈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这些谈判当然是值得欢迎的，尽管我刚才提到的不信任气氛以及复杂问题仍无法使我们对早期取得成果抱有信心。另一方面，核武器管制和裁军的谈判对各国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谈判不能依随任何国家集团间的关系变化而左右，必须积极地进行下去。

战区核力量谈判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性价值。就这类武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也是头等重要的。这类谈判表明在裁军方面出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迹象，并表明自由公众舆论中许多集团更广泛地参与了这些谈判。西方的情况是如此，在东方甚至也会出现一些反响。核军备竞赛的疯狂性以及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对各国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将会产生无法估量的灾难性后果，这一点终于越发深入人心。使人确实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核威胁已存在几十年之久，却并没有早些为人们所认识。尽管如此，今天能够认识也是值得大大欢迎的。

目前局势的事实是，对双方来说，核武器的大体均势意味着他们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核武器的威慑力量。企图进行第一次打击尽管是自取灭亡，但不能完全排除它会发生。这导致要求增加生存能力乃至寻求优势——即有保证的第一次打击的能力——的新的意图，这将会破坏稳定。而且，武器的纯威慑作用也在日益衰退。这是一种灵活反应理论造成的，这种理论强调理论上的可选择的、或核武器的对抗性使用，从而使核战争的爆发更加可能。在理论上这会导致加强纯威慑，以至提高使用核武器和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在这方面，仅照搬理论是对待和平或核战争问题的一个最危险的办法，如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果对核战争的现实状况缺乏富有想象力的认识，那么基于计算机和战争游戏得出的理论实际上就会成为降低战争门槛的因素。有人已泛泛地提到了在战争中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如果认为，强调核武器军事可用性——即不同于它们的政治威慑作用——的惊人的发展趋势，这本身实际上就降低了核门槛，这样认为可能是正确的。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核战争——即使是声称可选择的——是可以“打赢”的，这种看法会进一步推进这一趋势。我在上面提到的发展中的技术会使这种错误的想法更加“可信”，虽然在实际上，这种想法的基础是非常不稳固和不现实的。

既然大都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有限的核打击也会造成广泛的后果，而且这种打击也不可能保持有限的范围。正因为如此，灵活反应的理论正遭到越来越多的公众的反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双方最近企图通过部署新型中程武器来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所取得的意外的结果是暴露出整个理论的矛盾的和不可能出现的后果，也许也是核武器本身的矛盾和不可能出现的后果。

然而，当前局势的可怕死胡同是，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果真会大规模地使用核武器，但是这种使用所造成的后果当然也是瞬息间和同样大规模的。为了保证自己的防务，同时就保证了自己最后彻底的毁灭。

显然有必要使欧洲摆脱这一疯狂的局面，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不打乱已经建立的恐惧平衡——不论其多么不可靠和邪恶——要想消除过去三十年来轻率地在欧洲及其周围所造成的局面是不可能的。战区核力量的谈判出之于需要，必然要首先处理一些为数有限的问题。然而，核领域中的一切武器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发展中的技术会把它们联系得愈来愈紧密，这又往往会模糊战术、中程和中心战略核武器之间的区别。如果要使战区核力量会谈的最终成果有任何真正意义的话，就必须把这些成果扩大到其他战区核武器和运载工具。显然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是明显的，然而却是回避不了的。

在这方面，应毫不延迟地就减少战术核武器数量的问题进行特别的努力，以期最终消灭它们。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如果按人们想象的那样，应当交给最高指挥机关来决定，而不授权给下级指挥机构，作出这种决策就得耗费一定时间，那么，战术核武器的作用，业已被多次证明是——不明确的，在迅速移动的战场上使用这类武器来打击运动中的敌人的效果也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如果由地区指挥官来作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出使用战术武器的决定，那么这类武器会成为危险的导火线，这就会轻易地降低了核门槛并触发一场核大战。

这样，战术核武器——无论是中子的还是其他——就失去了可信的军事用途，并孕育着明显的升级的危险性。因此，战术核武器应逐步成为谈判的首要目标。核查问题无疑将特别使人烦恼，不以消灭这些武器为远景，就难以想象能得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为了保证军事均衡，裁军的同时应适当均衡地裁减常规武器。

最后，除非用战略核武器的广意来看待战区核力量谈判，否则它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战略核武器会谈不久将会恢复，以便保存可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废墟上挽救出来的内容，并努力地大量裁减超级大国具有过份杀害能力的庞大的战略武库。正如我刚才说的，瑞典认为迫切需要寻求种种办法，对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革新加以限制。

对上述想法作如下总结：

总的来说，考虑到最近武器技术的迅速发展，核武器被用来作为军事工具，继而在一场危机中当作政治工具这一点似乎是成问题的，这并非仅仅由于广议使用这些武器的影响深远的浪潮。考虑到人们普遍承认的大规模升级的危险性，整个“灵活反应”的理论似乎是令人怀疑的。“首先使用”的可靠性也将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常规武器作用的重要性似乎也增加了。因此，建立广泛信任措施伴随而来的重要性也将得以加强。

似乎有必要提醒各位注意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承担的在裁军谈判一切方面的中心作用。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过去由核武器国家独揽的关于核裁军的一切方面的讨论，现在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的高度优先项目。因此，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同超级大国间或军事集团间就核裁军的一切方面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的谈判连系起来是最为重要的。

现在我再回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的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即全面禁试问题。从本委员会一成立，讨论全面禁试条约的问题就一直摆在这个日内瓦的多边谈判机构的面前，但是众所周知，由于某些核武器国家的顽固抵制，裁军谈判委员会甚至无法开始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具体的谈判。我和与会的几位同事一样，曾多次阐明，利用协商一致的规则，去阻止设立各附属机构以确保能就各国代表团一致同意的裁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的项目进行有效谈判，这种作法是全然不能接受的。各位成员可回想一下，瑞典代表团曾表示支持这样的建议，即协商一致的规则不能应用于同程序性问题有关的决定。

我失望并悲哀地注意到，尽管我们作出了一切努力，全面禁试问题的境况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糟。曾一度被用来作为借口，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履行展开全面禁试条约谈判职责的三边全面禁试会谈，至今已中断了一年半之久。关于这些谈判的前景——如果有的话——迄今毫无消息。

核领域的不断发展表明，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仍和过去一样紧迫，尽管有迹象表明某个核武器国家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种观点绝不会被接受。全面禁试条约是重要的，因为它对于现有核能力以及获得核爆炸能力的进一步发展，能加以限制，或至少给它们造成更多困难。这个观点在过去几年未曾反复提出现在仍同样有效。因此瑞典希望各方都能同意在本届会议期间尽早设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工作小组全权谈判与条约有关的一切方面。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问题，地震专家小组正在全力以赴地制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地震监测的国际体制。这一工作清楚地表明，从技术的观点来说，管制全面禁试条约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在这方面，我愿提一提用分析空气传播的放射性物质标本来确定某些核爆炸的可能性。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已有一些观察站在收集和分析空中放射性物质。似乎有必要考虑将现有的观察站和今后将成立的观察站组织起来，对空中放射性物质进行国际监督似乎是值得的。这种系统无疑将成为获取关于核试验和其他形式的秘密核活动的情报另一种有效和经济的办法。而且，我们确信，这种系统会使我们对某些可疑事件可能获得更加明确的情报，例如象1979年9月22日在非洲南部所发生的事件。瑞典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适当的范围内审议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准备就此问题提出一份工作文件。

核武器对人类构成了威胁，只有消除这些武器才能排除这一威胁。因此核裁军是当代人们最为急迫的问题。由于看不到核裁军能迅速达成的前景，考虑作出某些其他安排以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危险也许是有用的。但是，我希望说清楚，任何这类安排都不可能取代核裁军。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核武器系统的复杂性和技术敏感性本身就是导致无穷无尽忧虑的根源。核武器系统技术上的失误和人为的错误会导致核战争，这样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显然有必要采取措施减少这种危险。大量事件已经发生了。

过去已作了一些努力来消除由于错误或错误估计所造成的核战争的危险。只要提一提美国和苏联之间就“热线”、“防止事故措施”和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及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某些关于国家核查手段的条款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些协定中的基本要素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必须保持可靠和可信的通讯联系。

关于通过禁止或限制使用核武器以减少核战争危险的问题，过去曾提出过一些建议。在这方面人们最熟悉的是禁止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观点。众所周知，在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核武器国家持有不同的军事理论，而且由于它们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所以无法就这些观点的基础达成一致意见。

第36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就保证不发生核战争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鉴于在核裁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结果，我认为无核武器国家和核武器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知道核武器国家准备再采取何种步骤来减少核战争的危险。瑞典认为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必须遵照大会的要求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这篇发言中所谈及的许多问题显然与这个问题是相关的。对别国的镇压以及对人民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行动说什么也必须停止，特别是因为这会导致紧张局势的加剧和超级大国的对峙。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战区核力量谈判，以及召开欧洲裁军大会的建议都必须大力促其实现，以期大量裁减武器和增强信任。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控制和限制军事研究和发展来寻求对破坏稳定的新武器技术的限制。还要作出巨大努力，停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各国和国际上还要采取辅助性措施，以减少由于意外事故而引起核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相互依靠的关系网会大大有助于加强核时代的稳定。

到今年三月，多边裁军谈判已进行达二十年了。我们准备怎样来庆祝这个大典呢？在1982年会议期间我们准备用什么行动来回答迅速增加和日益重要的世界公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众舆论的要求呢？——乔治·凯南最近把这种世界舆论称之为几十年代伊始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我们怎样才能不顾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努力合作，使生活在这个唯一的地球上的人民免遭在核时代里会导致人类毁灭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呢？

我们所有的人如果准备正直地、问心无愧地面对我们的选民的话，我们就必须认真严肃地以有效的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就这样行动吧。

主席：感谢尊敬的瑞典代表的发言和她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上午的休会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委员会同意的话，我建议会议就开到这儿，下午3时复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现在就休会。

就这样决定。

下午1时10分休会，3时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如今天上午大家同意的，下午委员会将听取其他几位代表的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对你——我们多年来友好相处的邻国的代表——表示祝贺，祝贺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并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的重要职务，我希望，二月份将是富有成果的一月，我们议程中的各种问题的讨论都将取得进展。同时，我还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们开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工作。

我还希望荷兰大使费因在他国首都担任新的重要职务时一切顺利。

最后，请允许我对意大利大使科德罗·迪蒙泽莫洛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今天开始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年会的工作是在整个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进行的。人们不得不遗憾地注意到，由于帝国主义强权政策的不断强化，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了，战争的危险增加了，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威胁也在不断加剧。为了取得军事优势并破坏了已建立的平衡，以利于西方，这种反对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

缓和的行动是近年来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主要根源。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各国武库中精心制造和新增添的新型武器及其新系统、以及军事开支的进一步增加；所有这些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

为了替增加核军备的行动辩护, 有人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有限核战争”、“可防止的”、“可示范的”以及其他的核打击等理论。提出这些论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抹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间的区别, 排除使用核武器会遇到的道义和政治上的障碍, 并为允许使用核武器作为第一次打击制造理论根据。

现在正在向世界舆论灌输一种思想, 即一场有限的核战争在现代条件下将是人道的和可接受的, 据称, 被摧毁的仅仅是各方的军事目标, 并且, 这种战争将能防止一场全面的核浩劫。这种学究式言论的虚假的性质, 并不需要成为军事战略家才能理解。这些所谓的军事理论家建议按照某些事先捏造的“规则”来进行一场核战争, 他们规定核导弹应“彬彬有礼地”爆炸, 也就是说, 不要在城市上空, 而是在那些被认为有利于宣布为军事目标的上空爆炸,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自已置于与现实不相容的矛盾之中。

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 它们相信, “核战争不可能是有限的”。1981年12月2日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的公报阐明了这一信念。

苏联认为, 要想在军备竞赛中打败对方, 并指望在核战争中获胜, 这是危险的疯狂行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Л. И. 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10月强调指出: “发动一场核战争并希望成为胜者的人, 只能是一个已经决定自杀的人。不管侵略者拥有多大的力量, 不管他选择什么方式来发动核战争, 他决不可能达到目的。报复必然会随之而来。”

在全世界, 大家都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加紧行动, 消除核浩劫的威胁。欧洲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反对战争和导弹的群众性示威和要求和平和裁军的集会已经成了时代的趋势。

如何拯救世界, 使之不再继续滑向核战争的问题, 是不久前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注意中心。会议谴责了使用核武器的各种理论和观点, 首先是“有限或部分使用核武器”的理论, 正如大会的一项决定所指出的, 这些理论导致了军备竞赛新的螺旋形上升。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

帝国主义使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的行动严重地使国家间的关系复杂化，这种行动遭到了绝大多数代表团的原则的批判。与会者强调，这一行动把东西方推向对抗，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危险，包括出现核战争的威胁。上届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家紧张地讨论了战争与和平这个紧要的问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不会参加这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主要讨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就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之多，在整个联合国历史上是创记录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决议是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

大会通过了题为“防止核浩劫”的宣言，该宣言的草案是由苏联提出的。在这份文件中，联合国权威性地、坚决地宣布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该文件还谴责那些允许使用核武器的理论是与人类的道德标准和联合国的崇高理想毫不相容的，并要求拥有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采取行动，以消除爆发核冲突的危险。该宣言被公正地认为是朝向消除核战争威胁的重要一步，也是朝向改善国际气氛的一个措施。

这一决定支持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愿望，并且和它们一致行动，这些国家寻求在实现核裁军之前，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认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并且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会上还通过了一些其他的重要决定。这些决定清楚地表明，相当多数的联合国成员国设法在全世界军备进一步升级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苏联的方针旨在恢复被美国中断的谈判、加强正在进行的谈判、并开始就尚未成为谈判题目的问题进行对话。这一方针在联合国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几乎所有在会上发言的国家都表示支持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进程继续下去，并欢迎苏美于1981年11月30日开始的限制欧洲核军备会谈。会议通过了二十多个关于裁军的决议，规定就制定出旨在限制军备竞赛的协定、公约和条约进行会谈（或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范围内、或是通过其他渠道）。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包括在最高级会议上——指出，我们愿意就限制军备竞赛的全部问题恢复被中断了的对话。我们认为，最迅速地恢复这一对话不仅有利于会谈的直接参加国——苏联和美国，而且和其他各国的利益也是相一致的。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多次表明，就最紧急的裁军问题进行双边对话会有助于在多边谈判的